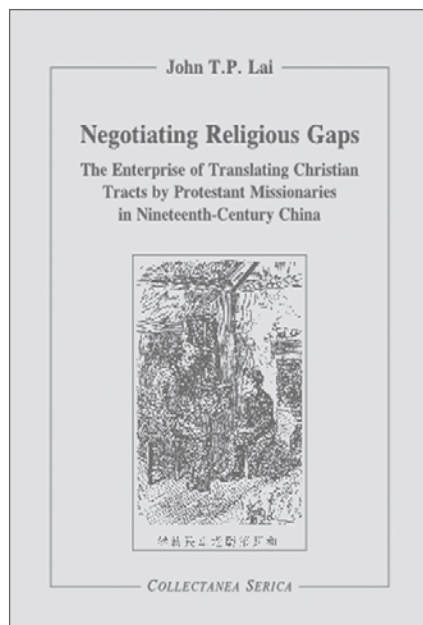


基督教新教漢語文學研究的興起

——評 John T. P. Lai, *Negotiating Religious Gaps: The Enterprise of Translating Christian Tract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 姚達兑



John T. P. Lai, *Negotiating Religious Gaps: The Enterprise of Translating Christian Tract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12).

一 新學術領域的出現： 漢語基督教文學

早在1960年代，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曾強調十九至二十世紀初年產生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文獻的重要性。他指出，「就十九世紀中西關係而言，新教傳教士作為這個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卻甚少有人研究。」^①費正清作此論斷，緣於當年他面對着一大批新到哈佛大學圖書館的珍貴傳教士文獻。1960年，位於波士頓的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總部將珍藏已久的全部材料贈予哈佛大學圖書館，其中，西方語言文獻存於懷德納總圖書館(Widner Library)，手稿、書信和檔案藏於霍頓圖書館(Houghton Library)，而東亞語言的文獻則轉交給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

費正清曾強調十九至二十世紀初年產生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文獻的重要性。這緣於當年他面對着一大批新到哈佛大學圖書館的珍貴傳教士文獻。自此，新教傳教士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才算正式起步。

黎著偏重於文學和翻譯研究，可謂第一部以基督教新教漢語文學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專著。有關材料和新近研究正在呼喚一個新學術領域——漢語基督教文學——的出現。

自此，新教傳教士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才算正式起步。1973年，在費正清的指導下，白威淑珍(Suzanne W. Barnett)完成了博士論文〈踐行的布道：新教傳教和西方文明被引進中國(1820-1850)〉(“Practical Evangelism: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to China, 1820-1850”)②。這是本領域第一部博士論文，偏重於中西關係史，尤足珍貴，然至今未見正式出版，影響遂微。1980年，參照本領域最重要的一部書目，即英國漢學家、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所撰的《1867年以前來華基督教傳教士列傳及著作目錄》(*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一書③，哈佛燕京圖書館館員賴永祥就該圖書館傳教士文獻的藏況撰寫出版了一部簡要的書目④。在1970年代後期和1980年代初期，哈佛大學曾召開兩次會議，討論早期入華新教傳教士的文獻，會議論文後來結集成《基督教在中國——早期新教傳教士的寫作》(*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一書，由白威淑珍和費正清主編，於1985年由哈佛大學出版⑤。此書至今仍是傳教士文獻研究領域的重要參考書。

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韓南(Patrick Hanan)是第一位從文學方面研究漢語基督教文獻的學者。他在2000至2004年間發表的重要論文和著作，討論了作為漢語文學的

《聖經》、漢語基督教文學寫作的過程和十九世紀的傳教士小說等重要議題，其前瞻遠見的論斷，至今仍未過時⑥。韓南討論的對象，已不限於哈佛所藏的材料，而且也包括大英圖書館和牛津大學鮑靈樓(Bodleian Library，錢鍾書譯)所藏的相關文獻。這個傳統後繼有人。

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黎子鵬的英文新書《協商宗教間の間隙》(*Negotiating Religious Gaps: The Enterprise of Translating Christian Tract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以下簡稱「黎著」，引用只註頁碼)由德國著名漢學研究中心華裔學志研究院(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出版，便是在前輩學者筆路藍縷開拓出來的道路上向前探索的結果。該書是作者根據2005年在牛津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修訂而成。與白威淑珍的歷史學博士論文有所不同，黎著偏重於文學和翻譯研究，故而可謂第一部以基督教新教漢語文學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專著。2012年，黎子鵬還出版了中文專著《經典的轉生：晚清〈天路歷程〉漢譯研究》，對英國文學史中最著名的宗教寓言、英國著名布道家班揚(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一書在晚清的漢譯情況進行了研究⑦。這兩部作品對近現代漢語基督教文獻、宗教和文學的互動，以及翻譯、比較宗教和比較文學方面的研究，皆有裨益。有關材料和新近研究，正在呼喚一個新學術領域——漢語基督教文學——的出現。

二 「翻譯的基督教」

十九世紀基督教新教文獻曾經在中國大量發行，但因為種種歷史緣由，現今中國大陸各大圖書館收藏並不多，這些文獻反而散落在歐美各地，尤以大英圖書館、牛津大學圖書館和哈佛大學圖書館三處的收藏最多^⑧。黎著的材料主要來源於牛津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大英圖書館，以及班揚博物館(John Bunyan Museum, Bedford)。因而，從這方面講，黎著具有其材料方面的絕對優勢。

文獻研究，當以書目先行。黎著附錄所附的六份目錄，包括：

- (1) 新教傳教士出版社或協會目錄；
- (2) 新教傳教士及其中國譯助目錄；
- (3) 1812至1907年間基督教文獻漢譯本目錄；
- (4) 1812至1907年間最受歡迎的漢語基督教文獻目錄；
- (5) 莫蒂母(Favell L. Mortimer)^⑨作品的漢譯本目錄；以及
- (6) 著名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⑩的漢語作品目錄。這些書目是書中討論對象的強有力補充，對後來者也當然是非常有益的參考。上海師範大學宋莉華教授著有《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一書，該書所附〈西方來華傳教士漢文小說書目簡編〉，可與黎著相互輔證^⑪。宋、黎兩書的書目，仍未足稱為全備。上海大學歷史系陶飛亞教授帶領的一個研究團隊，正在收集和整理一個更加全面的書目，令人期待。

黎著收錄的幾個書目的長處在於以下三方面：其一，關於作家及其作品的專題研究書目，尤其涉及到班揚和漢譯《天路歷程》、慕維廉

和莫蒂母這三個個案，黎著可謂幾乎窮盡。其二，研究漢語基督教文獻，經常會被問到這些作品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黎著的「1812-1907年間最受歡迎的漢語基督教文獻目錄」便從一個側面回答了這個問題。據此目錄，截至1907年新教入華百年大會的統計材料表明，最受歡迎的著作前三名分別是丁韋良(William A. P. Martin)著《天道溯原》、米憐(William Milne)著《張遠兩友相論》和賓為霖(William C. Burns)譯《天路歷程》(頁289)。另據美國學者裴士丹(Daniel H. Bays)統計，初版於1819年的《張遠兩友相論》一書，到二十世紀初，所有版本的發行總量高達一兩百萬^⑫。其三，黎著列出了一批贊助或傳教機構，以及與傳教士相合作的中國助手，也可看作是對漢語基督教文獻生產過程的複雜性給出了充分的輔證。

新材料的問世必定呼喚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初接觸這些作品，可能會追問這些作品產生的原因、過程、作品的性質及其影響和接受的情況。單就其產生而言，漢語基督教文學作品乃是中西文化碰撞的在場見證，也是宗教和文化協商的歷史表徵。十九世紀的基督教漢語作品，無論是方言俗語翻譯的《聖經》還是其他釋經作品，往往是以較為世俗的面目出現，有意無意之間融合了諸多本土民間宗教的元素。

黎著的第一章對這些作品產生的語境提供了詳盡的解釋。十九世紀新教傳教士在華的活動，幾乎摻合了諸多政治事件，諸如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太平天國運動、

漢語基督教文學作品乃是中西文化碰撞的在場見證，也是宗教和文化協商的歷史表徵。十九世紀的基督教漢語作品，往往是以較為世俗的面目出現，有意無意之間融合了諸多本土民間宗教的元素。

排洋排教運動等。缺少傳教士這一環節，必定無法更好地理解十九世紀的中西交往史；反過來說，忽略中西交往的衝突和融匯的背景，則也無法更好地理解基督教漢語作品的產生原因。在詳細解釋諸多文獻產生的歷史背景後，黎著也討論了不同宗派的傳教士對儒釋道以及本土宗教的態度、對中國語言(文言、普通話官話、方言和羅馬字)的看法，以及傳教士的翻譯工作對於晚清改良運動的影響等。

然而，更讓讀者感興趣的可能是黎著題目所示的「宗教間的間隙」。需要指出的是，新教傳教士對於中國宗教的理解往往失之於淺薄妄斷。他們容易將接觸到的世俗倫理如儒家的日常倫理，釋、道的流行信念和民間迷信等，等同於中國的「宗教」，基本上很少觸及到三教的形而上一面，比如宋明以降新儒家性理之學的宇宙論和世界觀等內容。其實，在世俗的一面，中西衝突與其說是宗教的，毋寧是文化乃至政治的。新教傳教士來華之始，面對的是勵行禁教的清政府。對後者而言，之所以禁教不在於其他，而在於某些教派影響到了政治和社會的穩定。

故而，理解漢語基督教作品產生的原因，可從兩方面看：一是形而下的，即西方軍事勢力和傳教士，一手持槍炮，一手持聖經，強行要求打開中國大門，是為「帝國的衝突」；二是形而上的、比較宗教和比較經學的理解方式，即漢語基督教作品是「比較經學」影響下觀念的碰撞、爭勝和重組，再融合中西傳統元素而產生的一種新的作品。

站在宗教的基點看，傳教士認為所有的漢語基督教作品都源於《聖經》，源於上帝之言。《聖經》既是宗教的也是文學的典律(canon)。作為一種道德律令，《聖經》不僅對宗教徒的實踐，也對文學作者的寫作實踐，有強大的規範性要求。十九世紀出現的諸多版本的中文《聖經》，可看作是「典律的分身」，傳教士漢語文獻則是「典律的分身」之分身，以此模式衍生不息。典律的核心內容乃是形上學和神學意義上的「上帝的真理」。這套「真理話語」移植至中土，被一般中國文人所接受的，可能遠非認識論或本體論意義上的真理，而可能僅僅是一套「倫理話語」。中西衝突在這種意義上，是兩套「真理話語」之間的衝突，而漢語基督教文學作品就是非常明顯的見證物。

黎著聚焦的是世俗化的層面，討論基督教翻譯事業背後的諸多文化、政治因素，諸如贊助機構、中國譯助以及基督教文本的本土化。黎著內文六章，第一章回答了漢語基督教作品的產生原因，第二、三章討論了作品的產生過程，第四至第六章以三個案例討論作品的性質。

從第二、三章的討論中可看出，作者取法於比利時翻譯理論家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的理論。勒菲弗爾指出，在翻譯的改寫過程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往往有兩方面：一是意識形態(ideology)，一是詩學形態(poetology)^③。翻譯的贊助者往往更感興趣於文化生產的體制化控制，尤其是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監控，而翻譯者往往又能從其文學實踐中，獲得更多的詩學和美

理解漢語基督教作品產生的原因，可從兩方面看：一是形而下的；二是形而上的。黎著聚焦的是世俗化的層面，討論基督教翻譯事業背後的諸多文化、政治因素，諸如贊助機構、中國譯助以及基督教文本的本土化。

學經驗，進而影響到譯作。黎著第二章討論了翻譯的操控者——贊助機構的意識形態審查。在這裏，「翻譯的基督教」(Translated Christianity)是指需要借助翻譯將基督教移植到另一種文化土壤中。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語言學家之一、俄羅斯學者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認為，翻譯有三類：一是語言內部的翻譯，即同一種語言的複述和解釋；二是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翻譯，即一般所說的翻譯；三是符號之間的翻譯，即以一種符號系統翻譯另一種符號系統^⑭。從這種視角來看，將基督教及其符號系統移植到中土，本身也是一種翻譯。十九世紀的「翻譯的基督教」，摻雜了諸多意識形態和詩學形態的因素，廣泛地觸及了當時的軍事、時政、經濟和文化因素。

黎著第二章以著名的基督教文獻出版機構聖教書會(Religious Tract Society)為例^⑮，詳細地考察了其贊助經費、翻譯文本的選擇和語言風格等等。聖教書會並無自己的譯員，但作為一個面向全球的贊助機構和出版機構，無形中控制了基督教作品的生產。聖教書會要求每一部譯作都須先經審查，再投入印刷，如此方能更有效地確保合乎某種意識形態標準(頁89)。聖教書會還要求所有作品以平實文風寫作，必須包含基督教真理，為罪人提供拯救的可能，而且應當入鄉隨俗，本地化為當地人可接受的模樣(頁65-66)。最終，聖教書會會將這些作品大量印刷，並低價出售或免費贈閱。

這種贊助機構的意識形態控制，固然影響到了基督教翻譯事業的生產和發行，問題是這種標準化生產的控制，對文學創作和重寫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聖教書會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對中英兩國的文藝和宗教方面皆有很大影響，其出版物追求簡易的文風，對繁縟的維多利亞文風(fluid Victorian style)有一定的矯正作用，也為晚清文學引進了一種新的書寫可能。然而，稍可補正之處是：在鴉片戰爭之前，贊助機構對新教傳教士的影響，並沒有如後期那麼大。例如首位入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雖要向倫敦會報告文字事業的進展，並要尋求其贊助，但倫敦會對其所選作品和出版，並不是絕對的控制。同時期的某些傳教士如郭實臘(Karl F. A. Gützlaff)，於1827年脫離了教會的控制，成為了獨立的傳教士，選擇自資或另尋資助以出版其作品。

再者，雖然存在機構的意識形態控制，但個體譯者的詩學理念，有時也能突顯在譯作之中。不過，確定譯者或譯者群體的身份是非常困難的。一方面，有的中國譯助藉藉無名，研究者難以考證出他們的生平，關於他們的翻譯狀況和詩學主張的片言隻語也較難追尋；另一方面，這些作者大多是低下階層文人，文學修為也有限，除作為譯助之外，可能並無其他文學活動。像王韜和蔣敦復那樣有很高文學才華的中國譯助，畢竟是少之又少。因此，黎著對於譯者的詩學理念討論並不多，亦屬正常。

黎著第三章認為大部分漢語基督教文獻純屬團隊合作的產物，但

將基督教及其符號系統移植到中土，本身也是一種翻譯。十九世紀的「翻譯的基督教」，摻雜了諸多意識形態和詩學形態的因素，廣泛地觸及了當時的軍事、時政、經濟和文化因素。

也強調了中國譯助的重要作用。韓南曾撰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充分地討論過漢語基督教文獻寫作過程的複雜性^⑩。第三章是同題之作，兩者可相互參看。關於寫作的過程，中國譯助留下的材料較少，大多數記錄還是單方面來自傳教士。本章討論了米憐、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包爾騰(John S. Burdo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的翻譯策略和風格選擇，但因為資料的缺乏，無法一一對應中國譯助的詩學主張並作出評斷。

關於中國譯助的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作者/譯者地位的演變。我們可以略為勾勒出的線索是：鴉片戰爭之前的傳教士譯助往往少有文學才華，也很少留下姓名，比如馬禮遜、米憐和郭實臘等人的助手幾乎沒有留下文名。但在1850至1860年間，在中國的通商口岸已出現了一些頗有文學才華的文人擔任傳教士的譯助，比如著名的王韜、蔣敦復等人。直到1895年傅蘭雅(John Fryer)發起小說徵文比賽，已經開始培養出了新一批的譯助和作者。此時的改良派文人也與傳教士多有深入的協作。傳教士也發現以前僱用的助手普遍而言水平不高，不如培養一批新的作家和譯者。這種嘗試無形中促生了作為他們譯助的口岸文人的主體性。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內容。

黎著的第四至第六章，分別提供了三個案例討論翻譯作品中的重寫所體現的本土化問題。第四章對漢語基督教文學作品作了一個全面的調查，並討論了新教漢語作品的複雜性，涉及了作品的類型、目標讀

者、出版和發行的方法。現今的研究多數集中在長篇小說，而忽略了大量存在的短篇小說，以及其他文類的作品如聖詩、教義問答和禱文等等。本章舉了一些例子，對不同文類的文獻作了詳細的解說。最後，作者指出雖然整個翻譯事業非常成熟，作品的發行量也不少，但這些作品有多少能成功地被讀者接受，卻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

第五章以莫蒂母《訓兒真言》(*The Peep of Day*)一書的四個中文版本來討論「兒童福音書冊」如何被一再地翻譯和改寫。這些作品的產生都是中英知識份子團隊合作的產物，即如黎著書題所示的「協商宗教間的間隙」的結果。作者選取了不同版本中相同的一個語句，通過對照細讀的分析方法，有意突顯四個譯本的譯者在翻譯策略上的大有不同之處，揭示了譯者對宗教和文化間隙的警醒。作者指出，此書的譯者不僅非常清楚中英文表達的文化差異，而且也深恐無法跨越不同宗教和文化——諸如中國的諸宗教和基督教/猶太教——之間的間隙。作者還討論了譯者所預設的目標讀者(兒童)和文本的功能(教化)。同樣，我們並沒有更多的材料證明彼時的幼童對於這部作品的接受情況。

第六章以《救靈先路》(*The Anxious Inquirer*)為中心分析了這個文本的本土化改寫。該書是慕維廉以文言譯成，預設讀者是受過儒家教育的傳統文人，而文本的功能也是教化讀者。慕維廉是一位多產的重要譯者，他的助手之中也不乏非常著名的文人如王韜、蔣敦復。

關於中國譯助的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作者/譯者地位的演變。鴉片戰爭之前的傳教士譯助往往少有文學才華，也很少留下姓名。1850至1860年間，中國的通商口岸已出現了一些頗有文學才華的文人擔任傳教士的譯助。

可惜至今仍未有專著或論文討論慕氏的文學翻譯。慕氏此書的預設讀者若是一般讀者，再借助學堂和宣講，其教義可能還較易被接受；但中國傳統文人恐怕並不易接受這種寓言/小說，也可能會因其對語言和修辭的更高要求而將這些作品拒諸門外。《救靈先路》的原著在英國頗為流行，而漢文文言譯本儘管採用了傳統文人熟悉的文學風格和詩學原則，但是可惜未能被廣大讀者所接受。究其原因，不僅在於翻譯語言的選擇問題，而且關乎語言所連帶的文化傳統及其慣性的問題。

三 未盡的問題

黎子鵬的眼光並不局限於中國本土，而是將討論的對象放在全球語境之中，黎著還討論了基督教文本如何從母國旅行到東亞，並在中、日、韓三國之間流轉的情況。因而，這項研究也似乎在提醒後來者，漢語基督教文獻的研究本身就是一個跨國、跨學科、跨文化的項目。在資料還未被充分發掘和重新整理出版之前，研究者可能要跑遍不同地區的圖書館，而且還要如同當年的傳教士一樣勤奮學習語言及不同地區的文化和宗教背景知識。

對本書和本領域可再延伸的討論，筆者僅提出幾個問題，以示獻芹微意。第一，如書題所示，本書討論的基點是站在傳教士一方，可謂是「宗教間的間隙」，然而對於中國讀者而言，是宗教的間隙，還是文化的鴻溝？如果十九世紀中西的衝突是宗教的衝突，那麼在具體的

討論中，是否應當更加聚焦於兩種或多種宗教形而上一面的異同？而對於中國譯助或中國讀者而言，是否真的存在宗教間隙？這些翻譯作品是否能起到傳教士所預設的作用？

第二，關於「商討」或「協商」(negotiating)一義，作為方法，有其可取之處，突顯出在翻譯或寫作的過程中各種動能(agent)的相互合作和往返角力。關於這一方面，我們或許可以追問每一個個案的複雜性：到底是誰與誰協商？又是否能夠或者在多大的程度上達到對話的可能？這批漢語基督教文獻，的確是由洋教士和中國文人合作的結果，但是其早期的作品，往往是由帶有強烈意識形態傾向的傳教士或贊助機構決定了其文化生產，多數情況下中國文人只起了工具性的作用。這或許也是因為關於中國譯助的資料過於缺乏，我們很難呈現出譯助的觀念，以及這些觀念與傳教士的觀念之間的對話、衝突和融合。

第三，此書已提出了中國譯者/譯助的身份問題，並充分地肯定了他們的功勞，但對他們所遭受的文化衝擊，並由此生發出來的新的詩學主張，似乎着力不夠。比如有一個著名案例是：王韜在助譯委辦本《聖經》(1854)後，用五七言詩歌體裁翻譯的《宗主詩篇》(1856)，既能深寄宗教的內涵，又有其明顯的詩學傾向^⑩。這些聖詩，既非西方的，也非中國傳統的，有其創造性的一面。倘能對相近的案例進行深入研究和平行比較，或許會有更多有趣的發現。

近年來中國基督教研究的範式轉向，已經將研究主題和方法從「基督教在中國」變成了「中國的基督教」或「漢語基督教」，那麼是否更應回到中國語境和站在中國知識份子的立場去討論他們的接受情況？

傳教士看待中國學問的方式是「聖經東方主義」式的，傳教士借助帝國主義勢力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則是「聖經帝國主義」。有關漢語基督教文獻的討論，可能需要聚焦於基督教全球擴張所帶來的倫理衝突，還要置於帝國衝突的大背景之中。

第四，近年來中國基督教研究的範式轉向，已經將研究主題和方法從「基督教在中國」(Christianity in China)變成了「中國的基督教」或「漢語基督教」(Chinese Christianity)，那麼是否更應回到中國語境和站在中國知識份子的立場去討論他們的接受情況？

第五，對傳教士而言，所有的作品皆是《聖經》和上帝之言的分身，那麼這種「聖經東方主義」(Biblical Orientalism)視角是否妨礙了他們看待中國語境和中國文本？進而言之，新教來華的故事，是不是一個「遭遇他者」(encounter the others)的文化故事？在這個故事之中，遭遇的雙方難免相互「他者化」。文化中心主義是可以相互轉換的，這種現象也值得一書。

第六，十九世紀的新教擴張，往往與國家意識形態和宗教勢力相互交織，那麼，看待他們的翻譯事業/文化生產，似乎也應更多地考慮到全球化、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因素。傳教士看待中國學問的方式是「聖經東方主義」式的，即是將這個他者的知識系統內化為聖經學的分支，而傳教士借助帝國主義勢力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則是「聖經帝國主義」。如此看來，有關漢語基督教文獻的討論，可能不僅需要聚焦於基督教全球擴張所帶來的倫理衝突，或許還要置於帝國衝突的大背景之中。

此外，明清天主教或其他基督教教派在中國也同樣留下了大量的作品。限於篇幅，黎著僅聚焦於十九世紀基督教新教的文獻。那

麼，後來者或許要進一步探問：歷時性地看，明清天主教文獻與近代基督教新教文獻之間，是否存在承繼的關係？共時性地看，同一時期天主教或其他基督教宗派的漢語文學/文獻作品的情況如何，是否與基督教新教文獻有可比之處？

總之，十九世紀中國語境中，本領域的「翻譯的現代性」課題可替之以「翻譯的基督教」的課題，更多地討論翻譯事業背後的泛文化和文化政治的因素，以及宗教和文化間的相互協商，傳教士與口岸文人、中國基督教與傳統宗教或本土民間宗教等等的互動。這些都遠非一部書所能解答，筆者的提問或許過於求全責備了。總括而言，就這一個新興領域而言，黎著已成為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迄今為止較為全面的圖景。

註釋

① John K. Fairbank, "Introduction: The Place of Protestant Writings in China's Cultural History",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ed. Suzanne W. Barnett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2.

② Suzanne W. Barnett, "Practical Evangelism: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to China, 1820-1850"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3).

③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④ John Yung-Hsiang Lai, *Catalog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Works in Chinese* (Boston, MA: G. K. Hall, 1980).

⑤ Suzanne W. Barn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⑥ 參見 Patrick Hanan, "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0, no. 2 (2000): 413-43; "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 Medhurst, Wang Tao, and the Delegates' Vers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3, no. 1 (2003): 197-239;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The Writing Process", in *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Exhibition Catalogue*, ed. Patrick Hanan (Cambridge, M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261-83;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⑦ 黎子鵬：《經典的轉生：晚清〈天路歷程〉漢譯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2）。

⑧ 參見黎子鵬：〈默默無聞的牛津大學館藏——十九世紀西教士的中文著作及譯著〉，《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2006-2007年第7期，頁38。

⑨ 莫蒂母 (Favell L. Mortimer)，英國女作家，著有一些教育兒童的福音書籍。1859年隨其夫來華到上海，次年始定居於山東，有中國譯助周文源。《訓兒真言》(*The Peep of Day*, 1833) 為其代表作，在晚清時有多個譯本和轉譯本。

⑩ 慕維廉 (William Muirhead)，英國基督教倫敦會傳教士，1847年

抵達上海，上海墨海書館創辦人之一。編譯有《大英國志》、《地理全志》。在向中國介紹現代歷史學、地理學、地質學方面富有貢獻。慕維廉也是1848年「青浦教案」的當事人之一。

⑪ 宋莉華：〈西方來華傳教士漢文小說書目簡編〉，載《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249-375。

⑫ Daniel H. Bays, "Christian Tracts: The Two Friends",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23.

⑬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 14-15.

⑭ Roman Jakobso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London: Routledge, 2000), 114.

⑮ 聖教書會於1799年由英國聖公會和不從國教派 (Non-conformists) 成立於倫敦，主要從事基督教書冊以及其他福音文獻的出版和發行工作。聖教書會在清末中國各地都有分會，關於在華聖教書會的詳細情況，其歷史演變、組織和管理，以及出版和發行情況，參見何凱立著，陳建明、王再興譯：《基督教在華出版事業 (1912-1949)》（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頁129-45、133。

⑯ 參見 Patrick Hanan,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261-83。該文中譯版可參見韓南 (Patrick Hanan) 著，姚達兌譯：〈漢語基督教文獻：寫作的過程〉，《中國文學研究》，2012年第1期，頁5-13、18。

⑰ 王韜：《宗主詩篇》（上海：墨海書館，1856）。